责任编辑 云帆 E-mail:yunfan73@yahoo.com.cn

参考文摘

■观 点

不能把转型期污名化

近年来有些人士的言行，正在将转型期污名化。

中央政令不畅，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中央的政策和统一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明拖暗抗，甚至自行其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旦露出马脚，“转型期嘛”；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受损，“转型期嘛”；有的地区，长期GDP挂帅，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价格高企，“转型期嘛”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垄断部门和行业坐享高收入，财富过度向小部分权贵者手中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转型期嘛”；有的地方，干群矛盾紧张，群众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甚至遭到压制打击，造成矛盾激化，“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酿成群体性事件，“转型期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些人中很有市场，甚至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养小蜜、包二奶，败坏党的形象，毒化社会风气，“转型期嘛”

转型期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垃圾筐，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有的人明明是决策失误、行政失误、工作失误、道德堕落、行为失范，但似乎只要一扯上转型期，似乎再大的失误也可以理解，再大的过失也可以原谅，再严重的损失也可以忽略，再龌龊的勾当也可以通行。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那些试图拿转型期说事，用转型期忽悠群众的人，是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的。

自觉担当起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深刻认识转型期特征，对转型期业已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探其源、察其流、审其变，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应对之策，这是历史和时代所赋予党员领导干部的重任。

中国的转型能否成功，根本的力量在于人民群众。只有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人民群众的力量一旦发动起来，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可能克服，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能创造出来。

（2010年第29期《瞭望》杨桃源）

政学合一：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

近年来学术界的反腐行动之所以成效甚微，就是因为它未能触动造就它的体制性因素。被批评的仅仅是涉嫌学术腐败的个人，而非其背后的体制性力量。治标不治本的学术反腐行动最终强化了有利于学术腐败的社会心理。

造就学术腐败的体制性因素究竟是什么？答曰：政学合一。

1990年代大批学术人开始登上管理者之位。懂学术者从事学术管理，原本被认为是顺应学术规律的大好事，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学术的春天。可是，令大多数人始料不及的现象出现了 随着政学合一，权力开始直接掌控和统摄学术；由于学术无法反过来制约权力，中国学术界逐渐蜕变为中国行政界、学术体系与权力体系完全同构化了；那些同时拥有行政职务和学术名号的人，几乎完全占据了学术资源；权力的等级性决定了这种掌控的等级性，与之相应的是学术体系的等级化；行政职务与学术地位之间形成了严格的对应关系，处于权力塔尖的学者也高踞于学术的塔尖；外行人要知道某个学者的学术地位，无需看其学术成果，只需看其行政职务即可；无论是行政会议，还是学术研讨，人们都会自觉地以行政职务为尺度排座位、定名次、分资源；那些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学人，往往在任何场合都卑微地屈居末席。政学合一令人们无法区别学界和政界、学术和权术、学人和官员，使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性日益淡化。

行政权力对于学术的全面掌控衍生出一个荒谬的现象：决定学者地位的并非是其学术水平，而是其所掌控的行政－学术权力。这本身就是学术不公。处于中国行政版图中心和其他重要位置、拥有较高职务、掌控较多学术资源的学者，无论成果多少，都在学术坐标系中占据显要的位置，可以比较容易地拥有最多的学术基金、获得最高奖项、在最重要的国内刊物发表文章。近年来，许多学术评审早已将权力的价码公开化了 几乎所有的评审表都要求申请者填写自己的职务，甚至将职务细化为厅级、副厅级、处级、副处级、科级等。其潜台词是什么，智力正常的人都能领会到。其结果如何呢？据统计，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然而，越是拥有高级别行政职务者，就越难抽出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越不适合承担重要的学术课题。他们游刃于庞大的权力网络中，既要频繁地开会和交际，又要应付繁杂的行政事务，自然无暇顾及学术。这些双栖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源，却无法将资源转化为成果，因此，或者占用别人成果，或者粗制滥造，乃是他们完成学术计划的必由之路。在如此行事时，他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支撑学术腐败产生的机制，是在赞美腐败者和腐败本身。

随着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全面掌控，学术腐败已经弥散化、常规化、体制化，衍生出完整的增殖和自我保护机制。我们如果真的想遏制学术腐败，必须在深于道德和职业规范的层面思考问题。中国当下的学术腐败其根源在于政学合一，因此，消除学术腐败的根本路径在于政学分离。在政学相对分离的上个世纪50—80年代，外行领导内行虽然造就了种种弊端，但却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单纯从事行政工作的外行不进行学术研究，自然没有占据学术资源的渴望，这客观上形成了行政和学术的相对分离之势。

前段时间，有些大学重新开始政学分离的实验：担当行政职务者不再兼任学术职务，不申请学术课题；由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裁决学术事务；以此为契机，标画行政和学术的边界，适当恢复学术的自治品格。这些举措可能还有所不足，需要更多制度性的保证和支援，但却让我们看到了些许希望。只有坚定地走政学分离之路，只有设计出保证政学分离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学术腐败才能真正被遏制，中国学术方会找回其失落的尊严和严肃品格。

（2010年7月《书屋》王晓华）

■评 论

如果没有互联网

一个官员，如果长时间不能适应网络时代带来的变化，跟不上时代步伐，无疑只能被时代淘汰。无论如何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都不可能拒先进的科学文明于国门之外，不然，我们又怎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何况，在信息时代，即使有心拒绝，估计也只能是一种妄想。

没有互联网，南京的周久耕就不会因一盒烟而“事发” 继续“好官”他自为之，更不会出现像有人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周久耕事件发生后，南京市的许多官员似乎一夜之间换了一身“马甲” 高档名牌服装不穿了 名牌手表不戴了，高级轿车不坐了，天价香烟也消失了。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逊军事件”，那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也不会传得如此之广。没有互联网，看辽宁西丰就像当地县委书记张志国的西丰，就有可能对报道辽宁西丰官员负面新闻的北京女记者纠缠不休，甚至有可能强行把女记者抓走（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互联网，“周老虎”就有可能成了“真老虎”，欺骗国人，甚至欺骗整个世界，开国际玩笑。没有互联网，也就不会有“山西黑砖窑事件” 多少人家的孩子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窑奴日子，多少家长要整天以泪洗面。没有互联网，湖北佘祥林冤案、重庆的“彭水诗案” 以及后来的“躲猫猫” 邓玉娇案，都未必会有后来那样的结果。没有互联网，有些地方的强制拆迁也就强制拆迁了，有的人（像聂树斌）冤杀了也就冤杀了……

对社会进步，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言，可以说互联网实在是太好了。而互联网之所以如此之好，主要的就是因为它透明度高，影响大，来得快。

尽管不能说网民就一定代表中国的“大多数”，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网络民意，也是民意。时至今日，众多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的民意事实上在推动着我们社会的进步。

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 内涵应该是很宽泛的，除了要保证“这个人”有饭吃有衣穿之外，主要是说要以他的合法权益乃至合法诉求为本。如果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合法诉求得不到维护，就算是让他“有饭吃有衣穿”，也还是不够。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维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合法诉求，“以人为本”的实质就要大打折扣。

世界上一些比我们更加文明的发达国家，他们肯定也会尊重网络民意，但未必需要到我们这个程度。这是因为那里的网民可以在更大的领域以更多的形式有更充分的诉求权，不需要采取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一位员工的合法权益受到资方侵害，只要诉诸工会，一般来说，即可得到解决。而我们不少地方的工会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为了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往往还需要走更多的程序，甚至即使走了更多的程序，未必就能得到解决。这大约也是一些网民之所以采取通过网络诉求的形式表达自己意愿的一个因素。如此说来，网络民意，事实上就是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民主表达不足的补充，说白了，求助于网络表达，往往就等于是在求救于更加有效更加宽广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民意可以算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 网络民意越盛，越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民主诉求需要扩大和保证。

（2010年第3期《民主与法治》闵良臣）

■学 府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探析

权威主义政治是介于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式，它一般生长在政治多元化的转型社会，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主张用强大的政府力量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俄罗斯政治发展在经历自由民主的挫败后，人们便开始转向历史传统，希望通过政治权威来摆脱现实困境，使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权威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权威主义导向越来越明晰的特征。叶利钦中后期、普京时期、梅德韦杰夫时期的执政作为都凸显着俄罗斯政治发展权威主义的基本特点。

在构成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各种要素中，权威主义的传统反映了俄罗斯的基本性质。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政权及其活动是主导力量，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其历史的神圣遗产。千百年来，权威主义虽在形式上有所变异，然而实质上的中央集权思想却始终为人们所信守，中央权威一直被人们当成是社会秩序的源头和国家强盛的希望所在。权威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公众性的崇尚权威、顺从强权的心理倾向，再加上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大国心态，使俄罗斯人在困难时期普遍希望“铁腕人物”的问世，来平衡自身的心理恐慌与失衡，来拯救俄罗斯国家的命运。

一般来说，政治合法性程度越高，政治权力的效能就越大。政治合法性可以从是否具备理念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来衡量。这三大基础相辅相成，共同为政治体系奠定合法性基础。虽然一切政权都有追求自身合法性的内在需求，但由于权威主义政治的特殊性质，更要通过经济发展的绩效来提高其政治合法性。

事实表明，普京权威式的可控经济模式取得很大成功：俄罗斯实现了连续8年GDP以6.5%—7%的高速增长；1999年，俄罗斯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2007年已接近9500美元。俄罗斯进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的行列。

但权威主义政治毕竟是非民主的，自身存在着诸多弊端，如排斥大众参与、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和政治多元性以及在防止和遏制腐败方面存在局限性，等等。当前，权威主义政治是基于俄罗斯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国情的一种过渡性的政治选择。从长期来看，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其必然的趋向。

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其经济基础，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其制度基础，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是社会基础，政治精英的行为与选择是促成转型的催化剂，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在今天的俄罗斯，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转轨为民主政治的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比较稳定的宪法体制秩序已经确立并发挥着其独特作用；民主政治已经是比较现实地获得了广泛支持的政治取向；俄罗斯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认可并在行动中不断地对其加以完善。所有这些推动着转型中的俄罗斯正在有条不紊地向民主政治发展。

（2010年第2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邱芝）

对外民意表达的革新

大国崛起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项结合民众意志、聚集民众力量和实现民众目标的过程。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让民众成为崛起的利益分享者，那么，这种崛起只能是暂时的、短暂的和易碎的。由此看，如何体现民众意志，进而能够更有效地聚集民众力量，完成民众的心愿，是大国崛起打下坚实基础的第一步。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的加强，当前中国面临的难题不仅是一个民众意志表达与政府之间的沟通问题，还要克服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问题。正如有人曾说，“当前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挨饿的过程，却还没有解决挨骂问题”。这个时候，中国民意表达不仅要成为一种需要让本国政府知晓的沟通方式，进而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中国与世界频繁沟通的手段。

针对当前中国民意对外表达太弱的困境， 民意表达要真正作用于中国崛起，成为令世界知道、了解和理解中国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就至少需要以下几点革新。

要对民意表达进行观念革新。在对外交往上，过去我们常常以“外交无小事”为由，由政府全权代办外交事宜。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国际形势的复杂化，政府的功能越来越无法囊括和满足民众对外沟通的需要。此时，我们必须进行民意的观念革新，认识到民意能够在许多领域弥补官方外交的功效。民意不仅有对外沟通、联系、信息传达等防御性作用，更有对外宣示、威慑、利益索取等作用。更重要的是，民意表达将为官方外交拓展谈判的弹性。在外交博弈时，民意表达中的利益诉求的尺度远远要比外交谈判来得宽。

在民意表达上的观念革新，就是在各种条件都允许的条件下开放民意。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也将形成民意与国家崛起的良性互动。在许多时候，中国应该让世界认识到，民意表达与中国政策之间的距离感和差异性。任何民意表达仅仅是中国多元的一部分，不代表中国官方意志，但有可能会作用于官方政策。

要进行民意表达的制度革新。充分认识到对外民意表达的重要功效，就要求制度上进行更多有利于民意表达的创新。其中，创建民意表达的多元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当前，中国民意表达最充分、最多元和最复杂的路径就是网络。但是，网络的弱点在于集中性弱、权威性小、观点分散、真实性差，要弥补这些弱点，真正令世界听到中国声音，还需要有各种制度上的创造。这可以参照西方民意表达的方式，打造一个聚合个人、社会团体、研究机构、政府官员在内的多元民意表达方式。尤其在个人层面，三类民意表达的代表非常重要：一是学者。中国应该鼓励更多的学者说话，让更多的学者有勇气、有能力和有实力表达民间观点。中国应该让世界知道，任何学者的言论都仅仅是民意的一部分，应该被解释成为研究成果、个人感悟或者政治偏好，与政策无关。二是人大代表。要鼓励、允许甚至开放人民代表的话语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大代表制度的实质作用。在这一点，美国国会议员的话语开放，是值得借鉴的，尽管他们的话语有时候显得非常极端和偏激。三是各级官员。鼓励一些官员敢说话，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民意表达。

要进行民意表达的技术革新。在民意表达上，观念革新和制度革新是根本，技术革新却是关键。如何让世界听到中国民意的表达，需要找到可行性强的技术方式。

要找到一种看得见的、可行的、有操作性的表达方式。当前中国越来越流行网络上的民意调查，这种方式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并使这种方式运用到外交、对外社会交往层面，久而久之，西方就不可能再忽视中国的声音，更不可能无视中国人的情感。

（2010年第2期《天涯》王文）

■纵 横

中美两国的富人有什么不同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美国家庭年收入13.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0%，他们被称作是美国最富有的家庭。而接近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2000美元，两者相差11.4倍。美国最富有的前5%家庭平均年收入在18万美元以上，是美国家庭中位收入的2.58倍。2007年，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额的34.6%。接下来富有的19%家庭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拥有财富总额的50.5%。这也就是说，美国20%富有家庭拥有的财富达到美国家庭总财富的85%。而余下80%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是美国家庭财富的15%。

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报告显示，2008年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50303美元，在财富分配上，美国的家庭有着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一半的家庭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状况，一半的家庭处于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状况，而这个家庭收入的分水岭就是年收入5万美元。另一方面，美国的“穷人”标准要远远高于联合国所定下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其贫困线标准是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为10991美元以下，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4051美元以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7163美元以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22025美元以下。也就是说美国的穷人标准比联合国所定的穷人标准，从收入上看就要高出30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中国总人口是132129万人。2007年中国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占总人口的0.03%。拥有的财富共计211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82万亿元。这些富人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60.1%，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2.895倍。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4140元。而按照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的数据，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中国目前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如果按这个标准中国的穷人数还真不是太多，但如果按照国际上贫困线每天1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又会有1.2亿至1.3亿人。

根据美国国税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1%的人所交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所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40.4%。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府一年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四成是由美国高收入的1%纳税人提供。相比之下，美国95%的纳税人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政府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39.4%。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有多少人呢？ 140万人。他们交的税比13400万中低收入人缴税的总和还要多。

2007年美国年收入410096美元以上的富人占美国纳税人总额的1%，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40.42%，年收入160041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占美国纳税人的5%，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60.63%。年收入113018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的71.22%。年收入66532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25%，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总额86.59%。年收入32879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50%，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的97.11%。年收入32879美元以下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50%，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的2.89%。

中国富人纳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资料不太全，只能凑合着对比。早前中国有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占总人口约20%的富裕人口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这说明，富人虽然拥有财富多，却不是缴税的大户，相反在中国实际承担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是广大的工薪阶层。想想看，这是否有点不对劲。说也奇怪，中国富人缴税不多，但富人却能把中国荣升到世界上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大国。中国富人出手之阔绰现在全世界闻名，啥贵买啥，啥名牌买啥，但对待自己国家却可谓吝啬得不得了 否则普通老百姓就不用缴那么多税了。

（2010年7月上《看世界》乔磊）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办公室电话：62805131 广告部电话：62806231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6234 网址：www.studytimes.com.cn 电子信箱：xxsb@263.net / xuexishibao@126.com
邮政编码：100091 定价：全年99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海淀支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 账号：261200084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照排：学习时报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